

近代以来 《论语》注疏辨正

陈洪杏 / 著

A Discrimin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Moder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ince 187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以来 《论语》注疏辨正

A Discrimin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Moder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ince 1870

陈洪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论语》注疏辨正 / 陈洪杏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6
ISBN 978 - 7 - 5201 - 2787 - 5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儒家②《论语》- 注释
IV. ①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3641 号

近代以来《论语》注疏辨正

著 者 / 陈洪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 字 数: 49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787 - 5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这是一本也许再花两年或更久时间才能让人比较满意的小书。从 2008 年动笔到现在，它的并不算太早的早出，主要是由于笔者感到过了不惑之年的人，剩余的高效的学术生命已不算太多，而前方尚有大片未开发的学术密林有待探险。

笔者感到比较大的遗憾是，“导论”对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探讨未能置诸更大的学术场域。一是未能有效地展示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与同期《大学》《孟子》《中庸》注疏之间的互动，与同期儒学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同期中哲、西哲、马哲研究之间的互动。二是未能较为切近地勾勒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在中国的发展与其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相互间的互动轨迹。目前，“导论”主要只是描绘了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基本格局的形成过程各个阶段及其主要特点。同时，笔者感到比较大的遗憾是，“导论”对所涉及的近代史的把握还相当粗浅，且是以描述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致诘式的方式来切入。以上两点不足，也许再花上更多时间，才可稍有弥补，但目前却只能让拙稿以现在的面目问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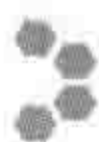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拙稿其他地方就完美无缺了。只是相较而言，笔者对那些地方略有信心罢了。首先，诚如上文所言，“导论”重在描述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嬗变过程，点出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并试图探究《论语》注疏的现代之路。受篇幅限制，详于 1870 ~ 1895 年、1895 ~ 1919 年、1919 ~ 1949 年前三阶段，尤其是第三阶段，略于 1949 ~ 2010 年第四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学界至今对前三阶段有代表性注本的发现虽已逐渐增多，但



遗珠不少，笔者感到有必要较全面缕述下这三个阶段。其次，也由于前三阶段处于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发展的可能性比较丰富，容易惹人兴致，而影响第四阶段的文化思潮则相对单调。最后，最重要的是，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大体格局在第三阶段末已基本成型，往后的70年，只是在变化了的时空里分流式地继续。因此，第四阶段便略写了。好在书末有两个附录，一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另一个是《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又一范本——读黄克剑的〈论语疏解〉》。这两位注家均属于第四阶段，一个为港台地区，另一个为大陆，各有代表性。可资参考。至于正文，涉及第四阶段注本的文字随处可见。

拙书正文分为三大部分。“上编”认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在体例上有明显突破，此即“依篇疏解”、“就章逐译”、“按句疏证”，因此这部分重在考辨有代表性注本在这方面的尝试。“中编”看起来更像是辨析《论语》注疏的传统做法的延续，即就有争议的章句，选取重要注本，一一予以辩说。不过，这部分其实缺了一章。自从郑玄《论语注》敦煌残本被发现、定州《论语》竹简本重见天日以来，学界便开始整理，并利用它们来考订《论语》世传本。拙书应对此有所介绍。只是笔者意识到这点已是在全书完成之后，而拙书篇幅显然已过长。“下编”将贯穿《论语》全书的大义提炼为四个论题：义利之辨、文质之辨、形上形下之辨、内圣外王之辨，在此四论题下，论说近代以来各有代表性注本之得失。相较而言，这部分是正文部分义理性最强的，亦是视野最宏阔的，笔者的《论语》观就此暴露无遗。“上编”则意在彰显近代以来《论语》注疏最明显的新创获，尤其是第一章对“依篇疏解”体例的讨论，相信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中编”看起来跟传统差别不大，但在章句义蕴的反复推敲中，却是最能考验论说之笃实与否。

笔者领略《论语》之路，有两位向导，一位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另一位是导师黄克剑先生的《论语疏解》（初版名为《论语解读》）。犹记得2006年秋，老师自人民大学文学院转入国学院，次年春季，即开始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底本逐字逐句讲解《论语》。笔者从这学期起便开始旁听，此后听过多次，课后常反复抄、读从古至今各种《论语》注疏，尤



嗜好李颀《四书反身录》这类以修身为主的注疏。不止笔记本上的字密密麻麻，课本的天头地脚也无处插针。那段时间，坐公车时，最喜欢就是手吊在车环上，心在默诵章句，忘了就拿出《集注》瞅瞅。在天津的单位九点才上班，住在北京的笔者总是八点二十就到单位大门，九点不早不晚一分到所里，这中间的半个来小时便在图书馆门前回廊度过。那戴着羽绒服帽子，套着手套，捧着《集注》逐句温习朱子注疏的冬日清晨，真是让人难忘。就在这反复阅读、揣摩各种注疏的过程中，《论语》的义理一点一滴渗入笔者心灵。而在这过程中，笔者总是有很多疑问，于是便时常向老师请教。老师大扣大鸣，小扣小鸣，笔者问得深，老师就谈得久，笔者问得浅，老师就谈得简。笔记做满了各种纸张。大概很少章句没有被深究过。如此情形，差不多持续了三年。附录二《读黄克剑先生的〈论语疏解〉》一文，因此于笔者有深切的纪念意义。不过，此文所透露的也是拙书的立足点，笔者有意选此文为附录，主要是为了读者便于了解拙书论说背后的义理构架。但拙书这立足点的选择并非出于私意，笔者相信，诸君倘读完全书，会同意这一判断。需特别申明的是，笔者没有丝毫以老师的注本抑扬其他注本之意，若拙书行文引起了哪怕是一丝一毫这方面的误会，都是笔者的错。这不仅是对其他穷年累月于注疏的注家的不敬，亦是对老师这位总是教诲笔者为人处事要谦退厚道的长者的不敬。恳请诸君谅解，请相信这绝非笔者本心。

16年前，在笔者还是个刚入校的博士生时，导师黄克剑先生送了笔者那一届弟子一段话，那话是出自宗白华先生译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2~163页脚注，老师借此勉励我们要对学术怀着“神圣的战栗”以引起“庄严的注意”。那段话是这样的：“大概从来没有人说出过某一更加崇高的东西，或一个思想曾被更崇高地表达出来过，像在那伊惜斯（Isis 自然母亲）庙上所写的话：‘我，一切存在的，曾经存在的，将存在的总体，没一个有死的人曾揭开过我的面幕。’赛格耐尔（Segner）曾在他的意义丰富的著作《自然论》书面图版上利用了这观念，以便他准备引入这庙宇的学生先期被这神圣的战栗所充塞，这个战栗调整他的心情进入庄严的注意。”16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接过老师抄在纸上的那段话，还是感到同样的亲切，只是，在这亲切感中，多了一份羞愧、惶恐：时时保持“神



圣的战栗”、“庄严的注意”，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拙稿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知放失了多少次这“神圣”、“庄严”了！而且，即便有“神圣”、“庄严”的时刻，所论说的就一定尽妥么？拙稿问世在即，恳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陈洪杏

2018年3月8日深夜于福州小柳

目录

Contents

自序	1
----------	---

导论：跨进近代门槛的《论语》注疏

引言 西学：“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入侵者?	3
一 从夷夏之辨到中西之辨 (1870年前后至1895年前后)	6
二 三种“体”、“用”论与《论语》注疏之致思 (1895年前后至1919年前后)	14
三 三种文化坐标系张力下的《论语》注疏之演递 (1919年前后至1949年前后)	32
四 两岸格局与《论语》注疏之断续 (1949年前后至2010年前后)	58
五 结语：《论语》注疏的现代之路在何方?	60

上编：体例辨正篇

小引	67
第一章 “依篇疏解”施于《论语》的依据、难题	69



一	从“依章疏解”到“依篇疏解”	69
二	“依篇疏解”的根据、意义	76
三	制约“依篇疏解”的第一重因素	81
四	制约“依篇疏解”的第二重因素	108
第二章 《论语》若干迻译示例辩难		137
一	“就章迻译”：从“话解”到“译文”	137
二	若干迻译示例辩难	142

中编：章句辨正篇

小 引	205
第一章 从《学而》到《里仁》章句辨正	207
一 《学而》“学而时习之”章	207
二 《学而》“孝弟也者”章	220
三 《为政》“为政以德”章	229
四 《为政》“思无邪”章	233
五 《为政》“五十而知天命”章	246
六 《为政》“孝乎惟孝”章	254
七 《八佾》“绘事后素”章 (附：《八佾》“礼之本”章)	259
八 《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	266
第二章 从《公冶长》到《述而》章句辨正	284
一 《公冶长》“性与天道”章 (附：《述而》“默而识之”章)	284
二 《雍也》“人之生也直”章	294
三 《述而》“游于艺”章	298
四 《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304
第三章 从《子路》到《宪问》章句辨正	308

一 《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 (附：《述而》“昭公知礼乎”章)	308
二 《宪问》“知我者其天乎”章	313
三 《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 (附：《述而》“天生德于予”章、《子罕》“子畏于匡”章)	317
 第四章 从《季氏》到《尧曰》章句辨正	324
一 《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附：《述而》“知之次”章)	324
二 《阳货》“性相近也”章 (附：《阳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章)	328
三 《尧曰》“尧曰”章	333
 下编：主题辨正篇	
小 引	343
第一章 “义”、“利”之辨	345
一 君子唯义、小人唯利？	345
二 孔子之前中国人心灵眷注的重心在于“命”	351
三 孔子之后中国人心灵眷注的重心在于“道”	354
四 “道”、“命”之辨	358
 第二章 “文”、“质”之辨	362
一 “君子”说、“历史嬗替”说、“仁”说	362
二 从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文质彬彬”	365
三 从社会风尚的淳化再看“文质彬彬”	370
 第三章 “形上”、“形下”之辨	376
一 朱子：“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376
二 近代以来注家之“中庸”观（一）	382
三 近代以来注家之“中庸”观（二）	388



四 近代以来注家之“中庸”观（三）	394
第四章 “内圣”、“外王”之辨	403
一 “修己”、“为政”纽结上的“教之”	403
二 “修己”而“为政”的极境：“无为而治”	410
三 “修己”、“为政”的错落：“境界”、“权利”之辨	417
参考文献	419
附录一：钱穆《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	442
附录二：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又一范本——对黄克剑《论语疏解》 的解读	456
后 记	476
鸣 谢	480

导 论

跨进近代门槛的《论语》注疏

引言 西学：“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入侵者？

大半个世纪以前，蒋梦麟曾形象地比较过 19、20 世纪的中国人对佛教、基督教东渐中土不同方式的印象，其谓：“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① 这当然主要是一种错觉，诚然有部分传教士、信徒确实依仗教会胡作非为。而且，正如蒋氏指出的，基督教^②和西方文化的东传早期亦是和平的；蒋氏所说的中国人，也不能包括澳门及与之毗邻的香山一带自 16 世纪起便与洋人密切接触，对洋人有一定了解的普通民众。

据载，1552 年 12 月，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 ~ 1552）踏上了广东的上川岛。^③ 此后，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甚至其自身即是科学家的耶稣会士络绎不绝经由澳门进入内陆，他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携着在其看来足以引发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好奇、

① 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第 13 页。

② 这里的基督教是广义的，包括天主教、新教在内。

③ 这是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华。第一次发生在唐朝贞观九年（635），波斯天主教聂斯托利派教士阿罗本主教到了长安。第二次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1289），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孟德高维诺到了北京。这两次传教与中国的近代关联不大，此处略而不论。



赞叹的科学、技术^①。在利玛窦（Francis Xavier, 1506 ~ 1552）、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 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等人的努力下，天主教在中国持续发展，到1700年左右，教徒总数已有20万人，传教士亦达153人。^②不过，之后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天主教和中国民间祭祀礼仪之争不断升级，康熙皇帝遂于1720年颁布禁教令^③，天主教的传播从此转入地下，其被官方目为类似于“白莲”、“无为”的“异端”、“邪教”^④。截至彼时，天主教传教士留下了多达186种人文、自然类的汉译西著^⑤。但这些新颖有趣的著作，只在明清之际部分士人中激起心灵的回响。^⑥唯一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明清政权更迭、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颇大的西洋技术，大概要算由葡人传入的制造佛郎机炮、红衣炮的技术了。但普通民众对这点并不了解，并且自清政权逐渐稳固后，这方面的军事技术也日渐衰落。^⑦可以说，随着中国禁教令的颁布、罗马教廷于1773年对耶稣会的解散和清政权的稳固，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便走向式微。倒是澳门、香山一带的民众，自16世纪起，日与葡人往来，或与之通商，或为其领航，或充其仆役，或任其买办，或与之

① 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指出，由范礼安确立，并由利玛窦付诸实施的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有四大特征：一、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二、“自上而下”的传教方法，传教士主要与文人学士谈话。三、间接的传教方法，即以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吸引有教养的中国人，使他们信服欧洲高度的文明。四、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参见Nicolas Standaert ed. ,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 - 180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pp. 310 - 311。转引自顾卫明《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 - 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上海：上海书店，2016，第285页）

② 参见Nicolas Standaert ed. ,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 - 180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pp. 382 - 383, 307 - 308。转引自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199页。

③ 参见孙尚扬、〔比〕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第343 ~ 363页。

④ 参见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7页及该页注7。

⑤ 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8页。

⑥ 据肖清和初步统计，“明清参与天主教书籍编辑活动（校订、校梓、参阅、笔录、修润等）的士大夫共有404位之多”。（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5页）可知能同情理解天主教、一定程度接受西学的士大夫当更多。但考虑到明清士大夫阶层人数众多，此类人仍属少数，若将其置诸更为庞大的中华帝国四阶层（士、农、工、商），则可见其更形稀少。

⑦ 参见程美宝等《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3 ~ 70页。



通婚、同居，甚至入教会学校读书，接受施洗，乃至出洋，等等。这些帝国的“边缘人”，由于中西交通，意外获得原来帝国体制难以提供的谋生机会，甚至有望由此以别种方式在帝国体制内得到擢升，因此即便洋人、西学在广袤的帝国陆地深受排斥，他们亦不至于仇视洋人，敌视西学。他们较熟悉西方文化，甚至对之有一定兴趣。不过为其所熟悉、感兴趣的西学，就现存有限史料来看，更多仍是局限于谋生或日常生活方面。^①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72 ~ 1834）途经澳门到了广州，新教传教士自此陆续入华，西学东渐翻开新的一页。不过，新教在华的早期传播可谓步履维艰，聚居于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所怀的猜忌、敌意，帝国禁教令的长期实施，这些都造成了严重障碍。^② 到19世纪中叶，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南洋一带留下的历史、地理、经济类的中文著作、杂志并不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该书对梁廷枏的《合省图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曾有过相当影响。此外，由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 ~ 1851）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行量曾达每月900份，这份在华人世界受到一定关注的报刊，被魏源的《海国图志》援引了28处。米怜（William Milne, 1785 ~ 1822）的初版于1818年的《生意公平聚益法》亦分别于1832年、1847年两度再版于澳门、宁波。^③ 但现有材料并未能证实华人、侨胞曾对西学表现出太大的超出信教或谋生的热情。

与民众精神上的封闭性可相互印证的是，这个以天朝自居的帝国从来就不屑于了解世界的局势，更不消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也不消说法国大革命、英国产业革命、德国古典哲学，即便是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亦茫无所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4、15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尤其是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逐渐扩大，差不多到了16世纪，中国俨然成了世界白银尤其是经由欧洲的拉丁白银的

① 参见程美宝等《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8~51页。

② 参见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89~99页。

③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又见孙尚扬、〔比〕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秘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彼时，广泛充当货币的白银有相当部分——自1775年后则几乎全部——源于美洲，其结果便是，由于缺乏货币主权意识、货币结构不合理，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过深卷入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市场有所波动，其必将动荡不已。最直接的危机便是，1810至1830年间拉丁美洲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地方政府无力维系银矿开采，金银生产因此衰退，全球白银供应减少大约50%。不但中国生丝、茶叶出口市场萎缩，而且由于白银在中国比其他地区昂贵的套汇基础此时也已消失，国外旨在换取套汇的白银不再涌入，同时，输入鸦片以换取中国白银，则因英国白银短缺、急需白银而大受刺激。19世纪前期中国因此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白银外流，整个国家陷入贫困、动荡，甚至后来还诱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然而，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还没有世界性眼光，更不用说借此以反省自身的缺陷了，举国上下几乎无一不把这场白银危机简单归咎于鸦片输入，一时之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了朝野。^① 类似这种粗暴地诉诸民族主义的事件，在中国近代一再上演。

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中叶，从西方发射来的炮弹一再击中了中国这个早就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的庞然大物，西学这才开始引起它惊诧而痛楚的注意。而这种注意，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混合了对剧烈的天朝陷落之失落感的有意无意的误读、曲解，这误读、曲解里，就包含了以浓重的敌对情绪来看待西学，将其视之为“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入侵者。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便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氛围。

一 从夷夏之辨到中西之辨

(1870年前后至1895年前后)

保罗·柯文 (Paul A. Cohen)、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① 参见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1808-1856）》，林满红、詹庆华等译，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二版。并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又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萌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